

（二〇二〇年一月二十日出版）

---

本期目录

---

【追根溯源】	流氓政治及张铁生现象	王 毅
【史海钩沉】	《新民晚报》是怎样砸烂的？	冯英子
【往事非烟】	疯狂时代血的记忆	王 骥
【研究报告】	内蒙东部“温和土改”与乌兰夫的文革倒台（上）	程惕洁

---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

【追根溯源】

流氓政治及张铁生现象

· 王 毅 ·

一、“白卷英雄”张铁生

余英时先生〈待从头，收拾旧山河〉〔1〕一文中提出的流氓在中国现代政治史中的地位，流氓、权力中心、知识阶层三者的关系等问题，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只要从“文化大革命”时陈阿大、张铁生之流的腾达给亿万人民，特别是中国知识阶层带来的深重灾难（而这一灾难至今远未被深刻认识），即可窥见一斑。仅以“张铁生事件”为例。

1973年，中国大陆有限度地尝试恢复在“文革”前一阶段被“彻底砸烂”的高等学校通过文化考试招生的传统制度。当时身为辽宁某生产队队长的下乡青年张铁生也因希望能够上大学而参加了考试，但是他的化学成绩仅为6分，物理考试则交了白卷。张铁生此时自知上学无望，于是当场在试卷背面向主考写了一封为自己交白卷而辩解的信，并在信中诋毁那些可能取得较好成绩的考生：“对于那些多年来，不务正业、逍遥法外的浪荡书呆子我是不服气的，而且有着极大的反感，考试被他们这群大学生垄断了。”此事被毛泽东的侄子、当时担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的毛远新（后来他因担任唯一直接向中共政治局传达毛泽东各种命令的“联络员”而攫取了更大的权力）得知，认为可以利用这个以无赖手段反对文化考试的事件而进攻自己的政治敌人。于是他立即命令，将张铁生此信的删改本加上题为〈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的“编者按”之后，在《辽宁日报》头版头条发表。

毛远新说：张铁生是块有棱角的石头，“我要拿起这块石头打人了”。于是《辽宁日报》的“编者按”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这门课的考试，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一份很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接着，《人民日报》等全国一切重要报刊，都以最显要的位置转载了张的〈答卷〉，并同时将张树立为“反潮流英雄”；江青更赞扬张铁生“真了不起，是个英雄，他敢反潮流”，并多次召见他，鼓动说：“好好干，我们正需要你这样的年轻人，你是个好干将。”在毛泽东、江青等掀起的这种针对周恩

来等人恢复国家秩序努力的“反潮流”浪潮中，张铁生被封为全国“教育革命的闯将”、“新生力量的代表”，他不仅被迅速擢升为他所入学的辽宁铁岭农学院核心党小组副组长、院党委副书记、以及更加显赫的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而且也由此而成为江青等人的狂热政治工具，例如他在各种报告会、座谈会、指示中到处宣扬：对国家机关要“动大手术，一切到底，不留后遗症”，等等。

类似张铁生这样的著名流氓政治闹剧，在“文革”时还有许许多多。但是，余先生对产生诸如此类现象（我称之为“流氓皇帝现象”和“张铁生现象”）之根源的论述，窃以为是可以商榷的。具体地说，（1）“流氓皇帝现象”和“张铁生现象”是否仅是或即是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不断“革命”、“破旧立新”的结果，抑或另有更复杂、久远的根源？（2）为什么在中国的政治结构中，流氓极易与国家权力相结合，甚至融为一体？社会机制为什么要在金字塔的最顶层与最底层之间建立这种密切的、经常性的联系？（3）在几千年的专制政治史中，流氓与国家权力的结合既然不断给知识阶层带来深重的灾难，那么为什么知识阶层又不得不始终积极参与、促进着这种结合？甚至许许多多像冯友兰那样的硕学之士，都不得不在流氓江青等的驱使下投身于“批孔”的闹剧？

对于秦汉以后的国人来说，流氓（更多的是各阶层中富于流氓性的人物）发迹，甚至于爬上皇帝的位子，实在是早已司空见惯的。要从敌手那里分得自己父身之肉羹的刘邦，大概是牌子最老而正的一位。刘邦的衣钵被后来无数大大小小的逐鹿者世代袭用，有名的例子如曹操骨子里即是“有权数，而任侠放荡，不治行业”的流氓胚，他靠欺罔父亲、诬诋叔父而骗得恣肆放纵的机会，更活现出流氓的品性（2）。后来的问鼎者们当然难有曹操的才学，然而其行止却往往惊人相似。例如宋武帝刘裕，发迹之前也是十足的流氓（3）。

流氓皇帝们的成功，其更广泛的意义在于对无数觊觎者的鼓励，在于为社会劣根性的膨胀和传染不断注入活力。为了保住到手的皇位，一个流氓皇帝可以杀掉千百个想当皇帝的流氓，然而新毒瘤的孽发却始终与这种专制政治的机体同生共荣。例如南朝最残暴的统治者宋明帝为了防人篡位，大肆杀戮宗室和朝臣，而他倚重的工具，即是一批日渐贪婪酷虐的幸臣竖夫。这些人出身于文化层次最低的社会底层，然而由于专制制度的需要，却使他们在转瞬之间有了与刘邦、曹操为伍的资格。

## 二、流氓政治与君主专制始终相互依存的原因

“流氓皇帝现象”与“张铁生现象”有着久远的根源，这几乎不需要什么证明。从刘邦到朱元璋；从发迹前一如家奴的高俅（4），到“少无赖，与群恶少博，不胜，为所苦，恚而自宫”的魏忠贤（5），人们对于这一切太熟悉了。而我们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为什么长期稳定、并以礼义廉耻、恒产恒心、宗法伦常、科举官制等等因素高度完备发达为标志的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模式，竟会允许、需要流氓这种品质、地位、活动地域皆极不稳定的阶层存在？甚至要把这个最卑劣、对社会和文化戕害最烈之阶层的代表人物，经常推升到权力金字塔的绝顶？

秦汉以后延续两千年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之所以能够在那么漫长的岁月中，始终保持总体模式和基本价值取向的稳定性，重要原因之一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孕育出了广泛普及和尽可能公平的科举制度、严整有序和高度发达的文官制度，隋唐以后这些制度更趋成熟。科举和官制的成熟稳定，其基本目的在于保证官吏的选拔和政务的处理程序最大限度地与大一统集权制度的整体利益相契合，而不是以这一制度中某一个人（哪怕是皇帝）或阶层的利益为出发点。如果没有这种维系各利益集团关系的共同原则，大一统政治—文化结构就将解体。所以社会机制也就必然把科举、官制、政务等的上述有序局面，视为具

有永恒价值的常规形态，并以此实现对流氓政治膨胀的有效制衡。但是另一方面，与维系大一统体系中各阶层的共同利益和相互平衡相对应的，这一切政治的运作是以皇权的启动、干预为前提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原君》中把中国几千年君主政治总结为“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功”，即是对上述悖论的深刻说明。因此每当常规形态下的运作无法充分保证君权专制的延续时，非常规的补充形态就会被启动。与维系君权这一根本目的相比，手段的选择永远是从属的。其实，早在大一统制度诞生伊始，这种补充效用就被设计好了，所以《韩非子·难三》对只知“尊贤以崇德”的孔子、子思等人着力批评了一顿，最后归结在：“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术者，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

不难发现，流氓政治的盈缩是与整个政治局面隆替的周期相匹配的。鹿失鼎革的天时历来给流氓们以一逞其术的良机，这无须费辞。要说明的是一朝一代之内的兴衰与流氓政治互为因果的关系。齐桓公任用背亲以谄主的易牙等人卒致身死国乱，是宵小专权很早的例子，但从中已可以清楚地看出，正是最高权力阶层内部固有的纷争拼杀，为流氓政治的膨胀提供了基础〔6〕。以后的帝王们并非不知殷鉴，他们也没有忘了告诫子辈：“毋迓宵人，维法维则！”〔7〕然而“宵人”这永远割不尽的毒瘤却始终伴随着专制制度而延续。流氓政治膨胀与专制政治发展的同步性，可以通过比较看得很清楚。《史记·佞幸传》和《汉书·佞幸传》所列宠臣在政治上的作用还极为有限，但到了南北朝，独裁专制与流氓政治间必然联系就已是触目惊心了。当然包括豢养流氓无赖在内的所有这些千年前的古法，怎样以更残酷的形式和更巨大的规模被继承弘扬，凡是经历过“反右”、“文化大革命”等等政治运动的国人都不会忘记的。

为什么不仅“奸雄”发迹成了帝王史的主干，而且那些为“乱臣贼子递相承袭”的诡诈手段，非但没有在“昭德塞违”的圣贤之道面前败下阵来，反而不断被弘扬完善，竟而光明正大地成为以后历代支撑整个政治体系的官制制度。的确，如果我们不能站在文化的深层回答这个疑问，也就不可能明白，为什么甚至在千百年之后的“文化大革命”时，上述传统依然被恪守不移，以至于“翰林学士院”（中央文革小组）重又成为“专掌内命”，至高无上的权力机构，而“天子私人”又再权倾天下了。

### 三、流氓政治与知识阶层的命运

有关古来中国知识阶层命运的问题固然极为复杂，但借一个例子，也未必不可以概括得很简单。荀伯玉作为谋主，竭其全力帮助齐太祖萧道成夺了刘宋的天下，但这位佐命元勋后来却见诬伏诛，时人叹曰：“伯玉能谋太祖而不能自谋，岂非天哉！”〔8〕能为帝王们谋天下而不能为自己谋一身，拿这样沉痛的话比喻两千年间知识阶层的命运并不过分，因为只要“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千年古法不打破，知识阶层对于生活道路、人格理想、宇宙观、思维方式等等一切重大问题的选择，就早已被整个文化—政治结构限定好了，他们自己决没有超越这限定的可能。而它们与流氓政治的关系当然也不能例外。

余英时先生说：知识份子鼎力帮助流氓恶棍升入政治中心，结果反而使原来在社会上举足轻重的知识份子靠边站了。余先生所说的这一重要现象，是很值得做一点儿辨析的。

#### ◇ 鸟尽弓藏 自古已然

首先，上述现象不仅不始于二十世纪，而且其历史几乎与中国的君主专制和流氓政治同样悠久。以流氓曹操、刘裕为例，他们之所以能够称帝称王，当然仰仗着谋主荀彧、刘穆之的尽心辅佐，刘裕甚至连字都写不好，以至需要刘穆之耳提面命地教他遮丑的办法。然而这

两位功侔伊吕的肱股（荀彧还是出身于当时最富文化传统的高门）之结局却一致得惊人：都是因为对流氓发迹之后，是否应该马上再去抢“九锡”略有踌躇，结果惹得其效命之主转眼间翻了脸，于是荀、刘二人也就被活活吓死（9）。一次没有被吓死的读书人如果依然“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曹操对付他们的办法就是“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10），恰如“反胡风”之后连成一串的“反右”和“文革”。与曹操相类且最有名的例子，大概是流氓朱元璋做了皇帝之后，藉口胡、蓝谋反而大杀公卿，连一代名儒宋濂等亦不能幸免。朱元璋还从此永废宰相制度以进一步扼制知识阶层，更妙的是他施暴时的振振有词：“自秦始制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虽有贤相，然其中多小人专权乱政！”（11）流氓做了皇帝之后，士大夫们反倒成了宵小和祸水，所以对他们的一切屠戮和凌辱都是国运民命之所必需，这种逻辑真成了中国专制主义和流氓政治历久弥珍的传世之宝。

#### ◇ 知识份子角色的被动性

第二，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体系中，知识阶层的“在社会上举足轻重”与否，永远是被动的，永远取决于整个体系的需要。早如《慎子·佚文》中就有“无贤不可以无君”断语，战国是礼贤下士的时代，然而那时的思想家就毫不犹豫地让“尚贤”去做“尊君”的奴婢，秦汉以后的情况就可想而知。所以，东方朔慨叹士人命运之由人摆布：“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12）帝王们对士大夫荣辱的予夺还经常与其对科举官制的驾驭融贯为一，如北魏道武帝说：台辅之职“在人主之所任耳，用之则重，舍之则轻”（13）；这当然更从具体制度上规定了士大夫命运的被动性。也正因为这种天生的被动性，所以尽管知识阶层由于整个体系的需要而经常被置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在传统文化模式中，这个阶层永远不可能在制度需要的限度之外，对包括流氓阶层在内的一切恶势力有更多的触动。东汉后期知识阶层在与宦官的对抗中非但没能打垮对手，反而招致党锢之祸，即是一例。

#### ◇ 知识阶层的内部倾轧

第三，知识阶层不仅作为一个整体而与其外部的流氓政治相互制衡消长；而且知识阶层内部亦必然分化出分别代表常规与非常规社会形态的矛盾力量。当我们赞叹知识阶层对圣贤之道的执着时，就不应忽视同在知识阶层内部滋生着对“道”的销蚀剂；而当我们注重士大夫“为生民立命”的崇高人格理想如何升华了整个民族的价值追求时，同样不应忘记：知识阶层内部的非常规因素也必然要与整个社会机体中的流氓政治等非常规因素相互渗透和激活，不应忘记这种相互渗透和激活对整个民族极大的戕害。这种“共振”可举明代许多士大夫争相党附流氓出身的魏忠贤为例，《明史》卷三〇六〈阉党列传序〉曰：“明代阉宦之祸酷矣，然非诸党人附丽之，羽翼之，张其势而助之攻，虐焰不若是其烈也。中叶以前，士大夫知重名节，……至刘瑾窃权，焦芳以阁臣首与之比，于是列卿争先献媚，而司礼之权居内阁上。迨神宗末年，讹言朋兴，群相敌讎，门户之争固结而不可解。……庄烈帝之定逆案也，以其事付大学士韩爌等，因慨然太息曰：‘忠贤不过一人耳，外廷诸臣附之，遂至于此，其罪何可胜诛！’”知识阶层对恶势力的献媚，在后来的“批胡风”、“文革”中再度成为最丑恶的现象之一。

从渊源上看，流氓政治可以上溯到战国的纵横术，而秦汉以后知识阶层与纵横家的传统又总是若离若即，宋代儒学家把“士大夫无耻”作为应全力矫治的“时之大弊”（14），然而险陂无耻的新流氓却依旧不绝于儒门。所以王安石虽然对孟尝君及其鸡鸣狗盗之徒极为鄙夷，但他依仗的却偏就是“诡变多端，敢行非度”的吕惠卿，以至于最后连自己也被吕氏作为“甚于仇讎”的死敌而倾陷出卖（15）。更典型的例子则如蔡京“天资凶讎，舞智御

人。……帝亦知其奸，屡罢屡起，且择与京不合者执政以梏之”〔16〕。正是因为有了政治—文化体制深层的这种需要，“任权者以倾巧为贤”〔17〕的弊政才会始终伴随着专制政治的发展，而知识阶层内部的流氓政治也才有了立脚和膨胀的根本。所以后来变本加厉地有了清康、雍帝鼓励士大夫暗中相互监视并向皇帝告密的密折制度，以及晚近更加丧心病狂的全国知识阶层间的大揭发、大批判。一位老作家说〔18〕：

长时期（尤其“文革”期间）萦绕我脑际的一直是这么个题目：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知识份子与知识份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或者说，一时占上风的少数知识份子，怎样利用工农干部来迫害其他知识份子。……许多往事都使我深深感到，即便是在文革期间，真正的工农也仍是善良的。少数知识份子整起旁的知识份子来，才手毒心狠呢！

本是同根生的知识阶层，他们的内部关系何以成了“你死我活”？何以用“手毒心狠”的流氓政治相互倾轧了几千年？这的确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 四、结语

余英时先生在《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中，论述了中国专制主义政治传统的始终绵延不绝，最后以一句十分沉痛的话结束全文：战国至今“二千三百年之间，只是架漏牵补过了时日，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以此警策之语作为本文的结束当然也非常恰当，也许这样说更周详些：二千三百年之间，尧舜周孔之道与流氓政治始终相反相成，二者皆未尝一日独行于天地之间也。

#### 注释

〔1〕余英时：《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0年12月号，页5—7。

〔2〕详见《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及裴注引《曹瞒传》。

〔3〕《魏书》，卷九十七，〈岛夷刘裕传〉。

〔4〕详见王明清：《挥麈后录》，卷七，“高俅本东坡小史”条。

〔5〕《明史》，卷三〇五，〈魏忠贤传〉。

〔6〕详见《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

〔7〕《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

〔8〕《南史》，卷四十七，〈荀伯玉传〉。

〔9〕详见《三国志》，卷十，〈荀彧传〉；《宋书》，卷四十二，〈刘穆之传〉；同卷，〈王弘传〉。

〔10〕见曹植：〈与杨德祖书〉，《文选》，卷四十二。

〔11〕详见谷应泰着：《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三，〈胡蓝之狱〉。

〔12〕《文选》，卷四十五，〈答客难〉。

〔13〕《魏书》，卷二，〈太祖纪第二〉。

〔14〕见石介：《徂徕石先生文集》，卷十三，〈上孔中丞书〉；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三十三，〈死事传序〉；《新五代史》，卷三十四，〈一行传序〉；《宋史》，卷四三八，〈黄震传〉等。

〔15〕见《宋史》，卷四七一，〈吕惠卿传〉；卷三三九，〈苏辙传〉。

〔16〕见《宋史》，卷四七二，〈蔡京传〉。

〔17〕陈子昂：《陈伯玉文集》，卷八，〈上军国机要事〉。

〔18〕萧乾：《北京城杂记》（北京：人民日报，1987），页113—14。

□ 来源：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

~~~~~  
【史海钩沉】

《新民晚报》是怎样砸烂的？

• 冯英子 •

## 一、文革前的《新民晚报》

创刊于1929年的上海《新民晚报》，现在日销170万份，订户远及美国，为国内晚报中之翘楚，但“文革”时期却被“彻底砸烂”。今年为“文革”三十周年，回过头去看看三十年前往事，很有意思，我为当时当事人之一，因追叙此事，盖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云尔。

到1966年时，上海报纸最有特色的是《文汇报》与《新民晚报》。1949年后《新民晚报》先后吸收、并进了《东南日报》、《大报》、《亦报》和《新闻日报》的一些工作人员。因此，这家报纸的成员来自五湖四海，不复是原先的《新民晚报》了。

文革前，为了体现报纸的集体领导，各地报纸的编辑委员大都由党员担任，只有《新民晚报》编委会，还有几名带点谘询性质、或被安排的党外资深报人。《新民晚报》编辑委员会的成员是：社长赵超构，副社长程大千，总编辑束纫秋，副总编辑周珂、朱守恒，还有几位是杨志诚、曹中英、唐云旌、沈毓刚、张林岚和我。这11人中，束、周、朱、杨是党员，束、周是1957年反右后进入报社的，朱原是《劳动报》的副总编辑，杨则由《解放日报》调来。几个非党员编委，赵、程、曹、张原是《新民晚报》的老人，唐、沈自《亦报》并来，我则由《新闻日报》调去。

## 二、文革初期动员的三阶段

1966年6月4日，《新民晚报》开始了“文化大革命”的动员，由党组书记束纫秋作报告，号召大家投入。整个运动，大致可以分成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发动群众，由党组成立了一个领导运动的“领导核心小组”，各个科室、各个组，也相应成立了“核心小组”。“核心小组”以介绍情况为名，实为运动群众。要揪那些人出来，贴怎样的大字报，其实都由“核心小组”准备妥当，群众不过是被他们运动出来，作为运动初期的打手。有的大字报，由“核心小组”派人写好，留下一点空档叫“革命群众”签名，有的“群众”以为签了名就算“革命”，于是喜孜孜地写上自己的名字，不料后来形势变化，自己竟成了“牛鬼蛇神”。

6月7日起，第一批大字报开始在报社出现，首先被点名的是体育组记者冯小秀，他在上海体育记者中极具名望，但敌伪时期在报社工作，受过处分，所以第一个被揪出来。跟着揪出来的是副刊组两位姓陈的编辑，大字报标题叫〈《新民晚报》的CC〉，真是骇人听闻。接踵而来的，是贴社长赵超构的大字报，其后是程大千、曹中英、姚苏凤和我的大字报。平日几位编委共处的办公室，被说成是“议论室”，而所有编委，也自然统统被叫作“黑帮”了。非常清楚，运动一开始，《新民晚报》的党组负责人的鞭子是重重抽在一批老知识份子身上的。

不料这个局势保持了没有几天，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运动也就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时，由毛泽东制定的“五一六”通知已经下达，彻底否定了“二月提纲”，号召批判混进党、政府、军队和文化等领域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新民晚报》同《文汇报》都在外滩的圆明园路上。这时，《文汇报》正在揭发陈虞孙，有人在《文汇报》看到了陈虞孙被贴大字报，说陈有一篇题为《钟馗捉鬼》的短文通过束纫秋发表在《新民晚报》上。《新民晚报》的“造反派”一查报，发现文中有“四个毛贼”这一句，认为是攻击毛主席的“罪证”。于是，他们马上贴出大字报，揭发了这个所谓攻击毛主席事件，一时间群情激荡，义愤填膺。在这个形势下，党组的“核心领导小组”招架不住了，群众纷纷要求上海市委派来工作组。6月下旬，中共上海市委派了三个人进驻《新民晚报》，以胡润松、李建华、朱守恒、王玲、赵有余组成了五人小组，领导《新民晚报》的运动。

这个工作组的第一件工作，就是鼓励束纫秋站起来。但作为党组书记和总编辑的束纫秋却被群众认定为“党内走资派”，在“攻击毛主席”事件发生之后，他更是站不起来了。大字报一下集中到束纫秋、周珂、王玲三个人身上。这时，工作组开始采取了“打击一大片”的手段，扩大打击面，以减少“党内走资派”的压力。

8月17日中午，《新民晚报》的“造反派”就在“工作组”的支持下，把赵超构、程大千、曹中英、唐云旌、张林岚、姚苏凤、吴崇文、乐小英和冯英子九个人，叫到俱乐部中去“斗争”。斗争会结束之后，由各组的学习组长通知上述被斗的九个人“停职检查”，并把他们的藤办公椅取去，换上普通的凳子。第二天，又没收了这九个人的所有证件，包括当时上海文化俱乐部的出入证等等，规定九个人集中在一起，在报社内部做清洁工。赵超构有一次悄悄地对我叹气说：“连一张办公桌也没有了，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不久之后，“造反派”即打出了“清查四旧”的牌子，到各个被斗者家中去抄家。他们在各个被斗者的家中翻箱倒柜，无所不查，什么衣服、书籍、照片、信件等无一幸免，地板也被撬开，壁炉上的烟囱，墙上的护壁，也被敲破。因为我是从香港回来的，按照他们的逻辑，以为一定有不少“反动”的东西。不料折腾了半天，一无所获。一个“造反派”查到了一套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以为大有发现；一个“造反派”对着一套《资治通鉴》，横翻竖翻，不知道讲的是什么，最后放了下来，却把我的信件、香港带回来的身分证一起拿去了（这些东西后来不知所终）。

1966年8月22日，《新民晚报》的“文革”领导小组成立，但当时的“工作组”也并未撤退，报社的“党组”同时存在，实际上这一阶段的运动就是由这个“三驾马车”所主宰，《新民晚报》的运动进入了第三阶段。

“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会”）成立之后做了几件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把报社门口《新民晚报》四个大字扯下来，放在报社门口，当众焚毁，并在当天由“文革会”负责改出了《上海晚报》。可惜《上海晚报》的好景不常，到了所谓“一月风暴”前夕，它也在一场风暴中垮台了。

“文革会”的第二件事是开了一个所谓“反革命罪证展览会”，把在抄家中所得来的金银首饰、生活用具、衣服、书籍，都当作“反革命的罪证”展出。如束纫秋的一架莱卡照相机，一顶法国式的便帽，特别是一些金银首饰，如家属的镯子、戒指，都成了“罪证”。

三、“一月风暴”和“牛棚”

“文革会”登台后，报社内的各种造反组织纷纷出现，每小组成立一个战斗队，三、五个人成立一个“司令部”，互相斗争、互相吞并，最后归结为“井冈山联合造反司令部”与“毛泽东思想造反指挥部”两大派（简称“井冈山”、“指挥部”）。这两派无休止的内战，长期控制和影响着《新民晚报》的运动，报社成为上海最出名的“老大难”单位。

这两个派别，“井冈山”加入了上海市新闻界革命委员会（简称“新革会”）。“井冈山”背后的策划者，实际就是张春桥和徐景贤。而“指挥部”则加入“上海工人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而“工总司”的头头即后来成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此外还有潘国平、陈阿大等人。所以，“指挥部”实际上也是王洪文一伙。这两派，“井冈山”以职员为主，“指挥部”以工人为主；职员的办法多，工人的力量大。两派不断发生冲突，经常大打出手，天天打打闹闹，一直闹到“一月风暴”。

所谓“一月风暴”，就是从《文汇报》开始的夺权，把在“文革会”手中的“权”夺过来。《文汇报》一行动，《新民晚报》马上跟上。当时，《新民晚报》已被改成《上海晚报》，“指挥部”一派工人多、力量大，一开始就冲入“文革会”办公室，夺到了权。于是“井冈山”一派被赶出报社，在外流浪。

过了不久，张春桥提出“联合闹革命”的口号，“井冈山”在张春桥的支持下回到报社，宣传“联合”。为了促使两派联合，王洪文、潘国平这两个“工总司”的头头也来到报社，为“指挥部”撑腰。双方各有背景、各有打算，议来议去却始终“联合”不起来。那时，“井冈山”的司令部设在圆明园路五十号三楼，“指挥部”的大本营则在二楼，两派势如冰炭。为了增加各自的“本领”，被关在“牛棚”里的“牛”，也成为双方争夺控制权的对象。

那时，在《新民晚报》的所谓“牛棚”中，关着十三个人。“牛棚”设在三楼楼梯上面的一个小房间中，十三个人膝头相对，动也不能动，据说这是当时一个叫严克英的“造反派”出的主意，目的是在折磨“牛鬼蛇神”。“牛棚”门口贴着一副对联，写着“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1967年3、4月间，张春桥在一次谈话中主张拆散“牛棚”，两派乘此机会各有活动。但当时的“权”在“指挥部”手里。那年5月13日，“指挥部”贴出了大字报，宣布除了“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之外，其余的人一律“解放”，回到各自的组内“参加革命”。被“解放”的九个人中，除了陈心浩是工人技术人员之外，其余都是老知识份子。当时，“井冈山”遭到“指挥部”抵制，凡是属于“井冈山”控制的几个小组，一个人也回不去。于是，九个人只好单独成立学习小组，推我作“召集人”。当时各个学习小组都出有墙报，我们也不例外，墙报取名《争朝夕》。

#### 四、制造《争朝夕》冤案

1967年冬，江青发动了“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张春桥也定下了横扫文化界的阴谋。《新民晚报》的“井冈山”赶快给徐景贤、张春桥送去了一份材料，说报社有个叫《争朝夕》的“古怪组织”。11月22日上午，徐景贤、王承龙在康平路接见“井冈山”的中心组成员，徐景贤说：

你们晚报是一个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文艺黑线相交织的单位，是一个大黑窝。有很多了不起的人物，真正挖出这些坏人、叛徒、特务、文艺黑线内部的人物。？？到必要时，把那



些公诸于众。12月16日和20日，“井冈山”两次上书张春桥，捏造《争朝夕》八个人的“罪状”，表示“晚报阶级斗争要从这些人身上揭盖子是揭定了”，并且“热切希望春桥对我们的斗争给以宝贵的指示”。张春桥在“井冈山”材料上作了批示。于是，上海新闻界一场罕见的迫害事件终于开始。

1967年12月22日，那一天是农历冬至，当天出版的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都用极大的篇幅登了署名“《上海晚报》井冈山联合造反司令部部分战士”的所谓〈革命群众来信〉，内容是这样写的：

编辑同志：

我们以万分愤怒的心情，向你们揭露《上海晚报》内惊心动魄的阶级斗争。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我们报社冒出了一个名叫“争朝夕”的组织。这个古怪的组织的成员是些什么人呢？有疯狂编写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连载小说的反动学术“权威”、有叛徒、有漏网右派、有反革命修正主义份子夏衍“二流堂”中的伙计、有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宣传指导科长、反动党团骨干份子、有30年代文艺黑线人物、当年疯狂攻击鲁迅的小勇士。就拿其中的反共老手、漏网右派、黑画家乐小英来说，这个家伙解放前一贯画反动漫画，解放前还画了《名人百态图》这幅黑画，恶毒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无耻美化蒋贼夫妇；解放后贼心不改，继续大画反革命黑画，疯狂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就是这样一批乌龟王八蛋，竟然打着造反的旗号，煽阴风，点鬼火，上窜下跳，挑动群众斗群众，矛头针对革命造反派，妄图反攻倒算。就是这批乌龟王八蛋，把自己打扮做“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受害者”，公然顿足拍台，诬蔑革命群众“把我们打成牛鬼蛇神”，要“追根”，要革命群众检讨。革命群众准备批判《新民晚报》十七年的新闻黑线时，他们眼看革命烈火要烧到自己头上，慌忙跳出来攻击革命造反派，妄图以批判“五十天”来保“十七年”。甚至公然贴出反革命大字报，说什么“嗣后凡是未参加组织的革命群众开会商讨有关事宜，我们有权利，也有责任参加，不得歧视，否则，你们所作出的决定，一概无效”。请看，这批混蛋的反动气焰多么嚣张，他们要“造”谁的“反”，不是一清二楚吗？

这封“部分革命群众”来信，《文汇报》登出时用的是四行黑体字做标题：〈《上海晚报》内一小撮右派翻天说明了什么？〉；《解放日报》用的是五行宋体直排标题：〈把混入新闻队伍的坏人揪出来〉。两报还各自登了一篇实际上由“井冈山”起草的“编者按”，长达千字的“编者按”只是重复这封信的内容，杀气腾腾。当天上海的人民广播电台，也广播了同样内容的新闻，说明张春桥、徐景贤之流对上海新闻界的进攻是迫不及待了。

22日晚上，“井冈山”纠集了上海师大和其他院校的红卫兵，组成一支打手队，分八路到被他们称为《争朝夕》的成员家中采取行动。那天遭殃的是程大千、曹中英、张林岚、唐云旌、姚苏凤、乐小英、吴崇文和我八人。这八个人中间，除程大千卧病在床，吴崇文有四个儿子在边上保护和唐云旌外，其他都受到极大的殴辱。

那天傍晚，我回到家中的时候，由施庆德带领的一批“井冈山”已在我家大门口刷上了大字报，看守了我的前后门。我一进弄堂，他们就把我揪在地下，施庆德还站在我的小腿上，他们轮流殴打我，逼我交代为什么从香港回来？是不是派遣特务？过了一会，又将我拉到弄堂中去批斗，把我的头揪到垃圾箱中，向公众宣布我是“反革命份子”。

不知他们怎么知道我那天去过一个姓许的朋友家中，又把我押到那位朋友家中，七手八脚抄了他的家。直到次日清晨一、二点钟，又把我从朋友家中带到茂名大楼的门房间，熟门熟路的从门角落里拿出行刑的木板之类，然后由几个人把我按在地上，打我的屁股，把屁股打得像肺一样肿大，到凌晨四时左右，才放我回去。

那次事件之后，我足足卧床半月才告康复。后来知道曹中英、张林岚、姚苏凤、乐小英那晚所受的折磨，远远超过了我。他们用板刷打曹中英的耳光，鲜血淋漓，而那天正好是曹先生的六十寿辰。他们把乐小英打得眼睛几乎掉了出来，使乐先生在弥留之时仍有余悸。而且，从此之后，又把我们八个人关入“牛棚”，变本加厉，加以折磨，三日一小打，五日一大打。只要“井冈山”的“造反派”高兴，随时寻点事故就可以将你毒打一顿，而且随时会到你家中行凶，来时必定拉上窗帘，守住电话，把你同外界隔绝，然后为所欲为。

## 五、虐待“牛鬼蛇神”

当时，报社两派是今天这派揪一人，明天那派揪一人；今天是威风凛凛的“造反派”，明天却变成“牛鬼蛇神”。《新民晚报》当时全部员工有219人，先后被揪出的有76人，占了总数的三分之一，后来被列为“审查对象”的有66人，占全体职工的31%。

“牛鬼蛇神”的队伍不断扩大，对“牛鬼蛇神”的人身侮辱与精神虐待也日新月异，与日俱增。两派对“牛鬼蛇神”的限制规定也越来越多，归结起来，大概有如下几点：

- 一 上班、吃饭，都要向毛主席请罪。
- 二 每人每月发十五元生活费，家属十二元。
- 三 每餐菜金，不能超过人民币三分钱。
- 四 坐时不许两腿交叉。
- 五 走路不可以抬头。
- 六 不许看大字报。
- 七 有病读“老三篇”医疗。
- 八 每天要交代一份“罪行”和思想汇报。
- 九 任何行动，要事先请示汇报。

“牛鬼蛇神”还要被强迫做一些力所不及的劳动。天热了，就把“牛鬼蛇神”派到高温浇版车间劳动，而且不给劳动保护，滚烫的铅屑溅在身上，马上是一个烂洞。有时冒着炎暑，替“造反派”去运冷饮，一不小心还要挨几下耳光。做夜班的时候，半夜或清晨回家不管远近，都得步行。

《新民晚报》有一位叫董天野的画家突然被“井冈山”揪出来，把他打得鼻青口肿，关入“牛棚”。有一天，“井冈山”的“造反派”把他从“牛棚”中叫了出去，但从此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有人说他跳黄浦江自杀了，有“遗书”为证，可是始终没有捞到尸首，几十年来一直是个悬案。一句话，凡是可以虐待人的勾当，“造反派”都想出来了。

那年春节，也是所谓“清队”的不久，每一个“牛鬼蛇神”的家门口都要贴一份由“造反派”统一起草的“认罪书”，规定不许撕掉，也不许脱落。有趣的是，经过几天，起草这份统一“认罪书”的“造反派”，自己也变成“牛鬼蛇神”被打入“牛棚”了。

“造反派”还“勒令”“牛鬼蛇神”向当地街道里弄的造反派组织报到，接受监督和批斗。平常邻里之间有点小恩小怨，或者子女吵过架，或者算水电费有过争执，这一下都乘时寻衅了。他们可以分配你去扫弄堂、掏阴沟、洗墙壁，而且规定掏阴沟一定要用手去掏，不能用其他工具。这种混乱的局面，维持了很长的一段时期。1968年9月，“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新民晚报》，运动才进入另一阶段。

## 六、工宣队进驻，漫长的“斗、批、改”

“工宣队”是北京的发明，上海很快就跟了上去。从1968年9月开始，上海各新闻单位进驻“工宣队”和“军宣队”，第一个行动是把各报纸、电台集中于上海淮海路、汾阳路口的教育学院和汾阳路上的海关学校，一起进行“斗、批、改”。这时，《解放日报》、《文汇报》、电台、电视台因为还有业务，所以分成大班子和小班子，小班子搞业务，大班子参加运动。而《新民晚报》则早被“砸烂”，自然不必分什么大小班子，把所有人集中起来就可以了。

“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以后，开始搞“斗、批、改”。整个新闻出版系统组成一个团，有“团长”、“政委”、“军代表”等等。每一个新闻出版单位组成一个“连”，有“连长”、“副连长”、“指导员”等等。《新民晚报》的建制为十九连，连长叫刘正香、副连长为周珂，指导员是王玲，专案组的组长是朱守恒。“工宣队”把连队当作真正的军事单位，每天跑步、上操，按着步兵操练做立正、稍息、分列式等动作；另一方面则继续要把“坏人”揪出来。本来已很庞大的“牛鬼蛇神”队伍，至此就更加庞大。《新民晚报》的几十个“牛鬼蛇神”被集中在楼梯底的一间房子里，有的拣到一张破板凳，有的弄一只破木箱，有的弄几块砖头砌起来作凳子，十分狼狈。而“牛鬼蛇神”中也还有些“积极份子”，对于别人的一言一行都向“工宣队”或“造反派”汇报，以示自己的忠诚。因此，“牛棚”中每天总会发生一些新鲜事儿，不是说这个“不老实”，便是说那个“想翻案”。

到11月中，“工宣队”又出了个主意，宣布全体下乡去“支援三秋”，地点是上海县的虹桥公社，其地在西郊公园以西，并且规定全体从上海教育学院步行到虹桥公社，行军休息途中还不断进行批斗。他们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一些莫名其妙的所谓“材料”，硬要曹中英先生承认他是“特务”，在西郊公园门口大斗特斗，把一个六十岁的老人折磨得死去活来。曹先生后来每谈起此事，仍耿耿于怀，不能或释。那次“支援三秋”，一直到过年前才撤回上海。1969年冬，从北京传来了什么“六厂二校”经验，“工宣队”自然也加紧了“斗、批、改”。尽管专案组的人四处奔走，各方搜罗，他们在我身上实在找不到什么材料，于是大胆假定我是“特务”。因为照他们的逻辑，我在香港曾是两家报纸的总编辑，待遇好、地位高，为什么要回来呢？一个知识份子对国家、对民族的感情，他们是永远无法理解的。有一次他们对我进行批斗，要我交代做“特务”的罪行，那个连长操着江北口音问我：“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你不是特务？”我反问他：“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特务？”他理屈辞穷，老羞成怒，拍着桌子说：“嚣张，嚣张！”两边的“造反派”，一看苗头不对，赶快拿起那本小红书，大叫：“打倒特务份子冯英子！”一场闹剧，就此收场。这样的闹剧，每天在这个大楼里的每一层、每一室反反覆覆地演出。

1969年5月，“九大”召开前后，新闻出版系统在陕西北路的辞书出版社搞了学习班，把各单位的一些负责干部弄去学习，由军代表韩宗礼负责。在开学典礼上，韩宗礼称大家为“同志”，宣称学习回去之后即可“解放”。但事实上根本没有此事。大抵也在这个时候，林彪的“一号命令”下达，散布着大战即将爆发的空气。新闻出版系统的人统统被赶下乡，先是在奉贤县的新寺，后来又在柘林附近的“五七干校”，进行了漫长的“斗、批、改”。在这里，很多干部继续受到迫害，有许多人被定了性。两派继续斗争，“井冈山”渐占优势。

1974年，新闻出版干校的团部由团长沈鸿寿在1月7日召开《新民晚报》干部会议，并在会上宣布撤销“十九连”，所有工作人员分调到别处工作。那年1月，我被调去辞书出版社工作，从新闻界被赶了出来。创刊于1929年的《新民晚报》，终于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被彻底地消灭了。

□ 来源：刘青峰编：《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2年

~~~~~  
【往事非烟】

疯狂时代血的记忆

• 王 骥 •

我从小爱打篮球，酷爱武术和拳击。1966年我在北京师大二附中上初三，是初三（6）班的学生，正好赶上文革。因为住校，我认识同学比较多，和老师、食堂大师傅以及学校工友的关系也都挺好。红卫兵的暴行劣迹，我知道一些，想忘也忘不了。有人说是我记性好，我说，那疯狂年代的暴力和血色，能忘得了吗？

把我记住的一些事情，分条整理如下。

（一）1966年8月1日，在贾某岩、李某妮、李某临等人带领下，北京师大二附中建立了红卫兵组织，很快就把校名改为“抗大军校”。红卫兵里有不少走读的同学，为了便于夜里提审、暴打和斗争老师、校领导，这些同学就都改住校了。

八一八之后，文革运动在学校里很快就发展到斗同学、打同学，红卫兵提出新的战斗口号要“斗倒三胡一白”。这“三胡一白”都是高中的学生，三胡是胡雁奚、胡炳端和胡继光，一白是白兆和。这4个同学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甚至彼此之间都没有个人来往，只不过对红卫兵骂人、打人、斗老师等行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一天下午，红卫兵聚集在宿舍楼东边的水泥乒乓球台，准备批斗校领导和老师，住在有色金属研究院的胡继光刚从家里来到学校（胡继光也喜欢武术，平时我们在操场锻炼时相遇，聊的也是武术的技击方法，讨论最多的是三指钩和五指钩的不同用法），就在他经过乒乓球台时，一群高中女红卫兵冲了上去，把他围了起来，拉拉扯扯。胡继光虽然练过武术，出于对女生的尊重，他尽量避免身体接触，没有做任何反抗。这时又过来七八个男红卫兵，一同奋力将胡继光拉到了乒乓球台上，准备批斗。站在乒乓球台上的胡继光，身体直立、两肘合拢在胸前，两手握拳放在前额处保护着头部和眼睛。突然，他腾空一跃，用了一个类似“虎扑”的动作，体重一百六七十斤的他像一块大门板一样，砸向了乒乓球台下面正在高呼口号的红卫兵们，顿时砸倒了七八个人。这时，只见胡继光一个鲤鱼打挺，站立后迅速向操场和校门方向走去，红卫兵都惊呆了，不得不给他让出一条路，眼看着他扬长而去。我在宿舍楼从窗户向下看，看的清清楚楚，还听见有几个高中女红卫兵高声喊着“流氓”、“反革命”……。

其实当时许多人根本不怕红卫兵，不少干部子弟和工人子弟没有加入红卫兵，大部分非“红五类”家庭出身的同学也不想参加他们的“红战友”外围组织。只不过考虑到红卫兵支持者的威望，不做过多的反抗罢了。我没见过红卫兵一对一打人的，都是一群红卫兵打一个人，从来都是以多打少。打老师和校领导时，不让老师抬头，必须低头看地面，他们害怕被打的老师认出他们的长相，抄家也是如此。如果被抄的人家有四、五口人，红卫兵往往要聚集二三十个人才敢去抄家，最少也得十几个人才敢出动。拿着尚方宝剑，也还是底气不足，因为他们在做的毕竟是邪恶的事情。

（二）有一天夜里已经10点多了，突然红卫兵要斗争学校党支部书记姜培良，于是，吩咐电工杨老师在宿舍楼和食堂之间的水泥乒乓球台附近，加了一个大灯泡。红卫兵把姜培良押到了水泥乒乓球台上，先是让他站着，后来又让他跪着，那皮带像雨点一样打在姜培良的身上。我在楼上宿舍的窗户看得非常清楚，有个红卫兵搬了一个课桌，又有红卫兵拿来了煤灰渣，姜培良被他们摁着跪在铺了煤灰渣的课桌上。现场指挥是李某临，带领喊口号的是张某佑，贾某岩、李某妮也都在场。后来有一个红卫兵一脚把桌子踹倒，姜培良从乒乓球台上的课桌头朝下摔到地上，顿时，头上的血就出来了。现场红卫兵一片欢呼，又把姜培良重新拉到了乒乓球台上，强迫他跪在课桌上，继续斗争和毒打，一直闹了大半夜。

（三）八月份天很热，特别是下午烈日炎炎，就像一团火烤在身上，让人喘不过气来。我亲眼看到红卫兵们把陆笃根老师从小食堂的劳改队里带出来，强迫她在烈日下跑步。陆笃根老师是个老太太，患有高血压病，跑了几圈，实在跑不动，红卫兵就拿皮带抽她，强迫她继续绕着操场跑，以此取乐。有个高中的女红卫兵还说：“就他妈这么个老东西，吴梅扎（一个女老师的名字）还管她叫妈妈老师”。说话间又是两皮带打在陆笃根老师的后背上。

（四）丁德泗老师是我们班的英语教师，转业军人，参加过解放战争、大西南的剿匪，在西南军区被部队挑选为飞行员，转入空军部队。由于参军前是西南联大贵州分校英语专业学生，抗美援朝时担任志愿军英文翻译，负责审问被俘虏的美军战俘和飞行员。

八一八之后，红卫兵组织全校的老师开会。谈对红卫兵运动的认识，红战友张某佑坐在门口监督开会。所有的老师都不敢说话，怕说错一个字被抓进劳改队，或在现场就遭到毒打。但是又不能保持长时间的沉默。张某佑说，沉默就是对抗。在张某佑的反复催促下，所有的老师推举丁德泗老师和另外一位丈夫是空军的女老师代表老师们发言。

老师们说，丁老师是复员军人，政治上最可靠。那位女老师是军属，政治上也没问题。你们代表大家说最合适。女老师的丈夫和丁老师也认识，女老师说，还是让丁德泗老师一个人说吧，他政治上可靠，语言能力又强。多说一句少说一句的没关系。

丁德泗老师首先表示对于红卫兵运动的支持，紧接着又说了两句：“革命行动是好的，但是，要注意政策，不要骂人打人、最好不要破坏公共财物，红卫兵和为红卫兵干事的人要注意自己的形象。……”等散会后，丁老师走到门口，张某佑就扯着哑嗓子说：“你他妈的这是污蔑毛主席的红卫兵，你等着瞧”。

第二天早晨，在学校门口，红卫兵用大字报形式贴出勒令如下：“勒令：丁德泗早上八点钟到劳改队报道”。贴在墙上的劳改队分为三级劳改队队员名单下面又新添加了一行字：“四级劳改队员丁德泗”。几个初一、初二的红卫兵企图把丁老师押进劳改队，未果。又来了以刘某为首的6个身高力大的高中红卫兵，强行把丁老师押进劳改队。

任何人都难以忍受劳改队中的酷刑与折磨，丁老师特别不能容忍人格的侮辱，从劳改队几次逃跑。先后去过中央文革接待站、国务院接待站，都不能解决问题。有一次在街上躲藏了两天两夜，悄悄潜回家拿了有国防部长林彪签字的兵役证，通过公安部联系到空军寻求保护，他是空军转业军人，空军的同志还记得他，很同情他，可是当时部队没办法介入地方文革，只能建议让他去找北京市新市委，新市委让他去西城区委，当他得知在西城区武装部有一个军队联络站，他去了那个军队联络站，联络站帮助他联系上了新上任的西城区领导王定华，王定华了解情况后给贾某岩打电话：空军方面说他在部队政治上没有问题。要求不许打丁德泗，贾某岩答应了。

丁德泗是1966年8月26日回到学校的，他听到有一个高中的红卫兵说：“昨天我们尅死了3个”（“尅”是北京土话“打”的意思）。丁老师问其他被非法关押在劳改队的老师，得到证实后，偷偷溜到大门口，他没有选择个人逃亡，而是勇敢的躲在传达室，在传达室老张和其他老师的掩护下悄悄拨通了王定华办公室的电话，把8月25日打死人的情况如实汇报，当天下午驻西城区武装部的一队解放军找二附中红卫兵头头谈话，使得红卫兵疯狂残害生命的现状受到了一定的制止。丁老师也从劳改队出来。老师们、同学们都钦佩丁老师的勇气和果敢。

（五）1966年8月19号星期一。前一天，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回到学校后，暴力活动迅速升级。宿舍楼北门外贴的那一副由谭力夫推销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由“基本如此”已经变成了“绝对如此”。除了高干子弟曹滨海在和一些红卫兵辩论之外，还有一些同学也在进行辩论，我们初三（6）班的王学忠就一直坚持反对这血统论的对联。在辩论中没有占上风的红卫兵气急败坏的骂人，个别红卫兵为了出气，又抡着皮带进入了关押老师的小食堂，抡起皮带去打老师。

下午4点多的时候，我看到王学忠同学站在操场东面的跑道上，看着初三年级的几个红卫兵和红战友，从楼上的窗户把他在宿舍用的被褥及其他生活物品全部扔了出来。带头扔东西的红卫兵叫孙某臣，是初三（4）班的，紧跟着他干的两个红战友一个叫浦某云，一个叫方某禹，都是初三的学生。他们刚才还在和王学忠辩论，辩论不过王学忠，就采取法西斯暴力手段，把王学忠赶出学校。我看到这情景后，帮助王学忠把被褥、枕头和其他生活用品收拾了起来，重新抱回到宿舍楼上去。同宿舍的几个红卫兵和红战友堵住了王学忠，不让他进门，还大声叫着：“这是红五类的宿舍，是红卫兵宿舍，不是红卫兵不能进，更不能住在这儿”。其他男生宿舍也没有空床位了，王学忠只能在楼道睡了一夜。第二天上午，也就是8月20号，我用自行车驮着王学忠的行李，帮他把行李送回家。

返回学校时已经是中午了。我在宿舍的洗漱间洗了洗脸上的汗，准备下楼去吃饭，在一楼和二楼楼梯的拐弯儿处，正好碰到初三（4）班的红卫兵孙某臣。其实，我们俩上初有的时候关系很好，此时不知道他招了什么魔了，居然指着我说：“王骥，你老实点！”我回答说：“你老实点！”他马上就骂我：“你狗崽子！”于是我也回了一句：“你，猪崽子！”他一下急了，说：“你敢骂红卫兵？”我说：“骂你丫的了，你丫就是猪崽子！”他叫喊着：“我们家是革命军人，你敢骂我们红卫兵？”我说：“瞅你的长相，你不是猪崽子，谁是猪崽子？你们一家子都是猪”。孙某臣这小子当时急了，指着我说：“你找打！”我说“你丫敢？！”我指着楼梯拐弯儿处的水泥扶手，盯着他的两只小眼睛，跟他说：“你敢碰我一下，我马上让你磕死在这儿”。他有些不知所措了，这时有几个下楼吃饭的同学把我们两个人给分开了。等我吃饭回来，孙某臣带着浦某云、方某禹等红卫兵和红战友，正从我住的宿舍窗户往楼下扔我的被褥和其他生活用品。

我立即回家拿了照相机，装好了胶卷，把散落在地上的被褥和生活用品拍摄了下来，留作证据。3天以后，8月23日上午10点多钟，我去学校了不在家，以初三（6）班鲁某征（女）为首的一队十几人的红卫兵闯入我家，殴打了我母亲（一位历史清白的知识分子、全国妇联宣教部的普通干部）抄走了我们家几乎全部的生活用品，包括我那个莱卡120照相机，以及其中拍摄有红卫兵在学校所犯罪行的胶卷。

（六）1966年8月25日这天，曹滨海的母亲樊西曼和二附中姜培良书记、靳正宇老师共三人在校园里被打死，我所知道的8·25事件中的几个现场凶手和打手的有关情况：

1、高二有个女生在学校里打老师和校领导打得挺凶，当时我们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有一天她在食堂门口打老师，食堂的大师傅背后叫她“白不吡咧”，食堂的白师傅说：“这个白不吡咧是个白虎……”，厨师组长石凯说：“当着学生别乱说，都是红卫兵小将……”。这女生长得有点儿瓦刀脸，脸色惨白的，短发，后来知道这人名字叫王谦，几乎所有在劳改队的老师她都打。这个白不次咧王谦，打人的时候，还高喊，说脏话。虐杀革命干部樊西曼的现场，她不仅暴打樊西曼，还一脚将樊西曼从水泥乒乓球台上踹到地下，拿大棍子像砸夯一样砸她。

2、刘某平，初三（4）班学生，1950年出生，身高1米84，小脑袋、小眼睛、瘦高个，皮肤发黑，住在花园路一个部队家属院，是学校篮球队的队员。

刚上初一时，经体育老师刘国祥推荐，刘某平课余时间到什刹海体校参加篮球训练，负责训练的三位教练，除了叶教练是上海体院分配来北京工作的，其他两位教练董广森、祖振生都是师大二附中毕业生，对刘某平特别照顾，精心培养。初二结束升初三的时候，刘某平有两门主要功课补考没有及格，根据学校当时的规定，两门功课补考不及格被定为可以在校试读。他的家长专门来学校找过班主任郝素馨老师，郝老师解释后，家长不满意，一定要见校领导，郝老师把家长带到了教导处。

厉益森主任安排教导处的一位老师向家长介绍了学校的政策，家长提出：“我们是革命干部，我们的子女应该得到照顾……”。教导处的答复是：“根据教育局的文件，试读生可以照常参加班里的所有课程学习，但是不能代表学校参加任何体育比赛……”还提到了上一年的例子。也是篮球队的一个同学叫刘小范，平时课余时间先农坛体校练习篮球，由于主要学科功课不及格，初二的时候成为试读生，初三考试仍不及格，被迫退学了。刘小范的父亲是国务院某部重要部门的一位领导。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叫孟小幼的藏族同学，父亲是在红军长征过藏民区时参加红军的，也是由于连续两年两门以上的主要学科不及格试读，补考还是不及格，被劝退学了。

北京市什刹海体校每年要对参加业余训练的在校生，进行学习成绩登记和评定，功课不及格者，必须停训，这是当时北京市教育局和体委共同制定的政策。刘某平拿着成绩册多次找了几位任课老师，希望能够通融一下，给他改一下成绩，把不及格的分数改成及格分数。这个在成绩上作假的请求，遭到了拒绝。由于两门以上的功课不及格，刘某平的成绩册不能按时交给体校，体校停了他的训练课，当时他就对这些任课老师以及班主任怀恨在心，多次扬言有机会一定要收拾这帮老师。

学习成绩不好，体校又不让打篮球了，他就更不想在学校读书了，希望能有个地方让他去工作，最好是能当兵。1966年4月份，在我和杨林（我同班同学，校篮球队后卫）的帮助联系下，八一篮球队同意刘某平参加初次测试。他骑着墨绿色二六飞鸽牌自行车，从北太平庄一直骑到了海淀区红山口八一体工大队，负责对他进行考试的是正在组建中的八一青少年队的教练韩子栋和周正云。两位教练对他的身体条件以及篮球技术都不是很满意，在他的再三请求下，两位教练告诉他，半年以后，如果身高长到1米87，可以再来试一试。在一旁观看测试的北京籍八一青年队的张宏告诉刘某平：“想进八一队的人挺多，现在进来很难的”。刘某平回到学校后，每天都做有助于增加身高的运动。

五一六通知发表后，学校很快就进入了文化大革命，8月1日刘某平加入了红卫兵组织，声称自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受害者，对老师们的报复也就从此开始了。

刘某平经常抡着军用皮带或拿着垒球棒，出入非法关押学校领导和老师的小食堂（当时是私设的劳改队监狱）殴打老师。八一八以后，刘某平在篮球场亲口说过，他们几个爱打篮球的红卫兵在篮球场的三秒区罚球线上进行投球比赛，谁进球少就算输了，输的人就进入篮球场旁边的小食堂打老师，然后再进行下一轮比赛。刘某平曾经公开表示过自己虽然瘦，但是会用爆发力打老师，说有些红卫兵虽然块头很大，只会用蛮力，远不如用爆发力打得狠。

平时，有一些初一、初二的红卫兵在那里看管被非法关押的老师，他们拿的都是练习刺杀用的木枪，打老师的时候，除了用军用皮带抽，用木棍揍，还用木制的枪头去杵。刘某平指导这些初一初二红卫兵打人的技巧，让他们将木枪掉过来用，用枪托打，打得狠，打得疼。8月25日下午在杀害樊西曼的过程中，这些木枪真的派上了用场，施暴的红卫兵用枪托击打、狂砸樊西曼。

打死樊西曼之后，他们又用木枪的枪托，砸向被非法关押在劳改队的老师们。有一个红卫兵抡起木枪的枪托砸向崔胤魁老师的头部，崔老师因为年轻时学过体育，反应比较快，下意识地抬起胳膊保护自己的头，木枪托打在了胳膊上，胳膊立刻就被打断了，造成严重的骨折。接着，红卫兵又打折了另外一位教政治的男老师的胳膊。

虐杀革命干部樊西曼时，刘某平用的是一根大棍子，他像砸夯一样，用棍子的一头砸向樊西曼。同时，他还吩咐同班一个叫钱某的红战友一起打（学校“红战友”是个松散的组织，负责人是张某佑，各班红战友跟着同班红卫兵一起活动）。钱某家住钢铁学院，也是篮球队的，身高一米八多，平时还练习推铅球，比刘某平力量大。他就听刘某平的指使，跟着刘某平一起打，让他打谁，他就打谁。

红卫兵后期，刘某平拿来一只抄家时保存的气枪，藏在学校隐蔽处偷偷向老师和他不喜欢的同学射击。1968年刘某平去东北当兵了，一年以后，死于意外事故，时年20岁。

3、文革前，高一的刘某是学校足球队的，业余时间和初三（4）班赵东辉（小黑子）一同去北京市少年宫足球队参加过训练，我在少年宫篮球队，篮球场就在足球场旁边，每次练球时都能碰上，一来二去大家就熟了。文革中，刘某打人挺凶，还打同学，连女同学也不放过，军宣队工宣队进校的时候，刘某感到很恐惧。我去下乡插队之前见过他几次，那一段时间，他显得特别胆小，我和他没有利害关系，从来没发生过冲突。和我同住一间宿舍的王殿修也是老红卫兵，对刘某也有一定了解，我们都觉得刘某有心理障碍，文革中打人太多了。我们班的王新生同学是校足球队的，也参加了红卫兵，他亲口对我说：“刘某丫的真没劲，连咱们学校女生都打……”。

红卫兵解散后，刘某一直害怕别人报复。有一次我们在宿舍打拳击，有人说刘某也练过，而且说他块儿大，邀请他来我们宿舍交流一下。我让初一、初二的同学几次叫他，他就是不来，后来还是我硬把他拉来了。来了后我们让他带上拳击手套，他就靠着墙角一动都不动，拿手套捂着脸。他说：“你们要想打就打我吧，我不动了”。当时显得特怂，说话也结巴了，临走时他说：“我担心你们在宿舍里堵上门打我……”。其实根本没人想打他，是他自己打人打多了，担心别人记仇，怕我们替别人报仇，收拾他。我们和他无冤无仇，更没有人托我们复仇，是他有心病。

□ 来源：地方文革史交流网

~~~~~

【研究报告】



## 内蒙东部“温和土改”与乌兰夫的文革倒台（上）

• 程惕洁 •

前言：研究内蒙东部土改，意义何在？

七十多年前的中共土改运动，既有模仿苏俄的意识形态因素，也有农民造反“均贫富、等贵贱”的历史惯性，可说是毛时代许多暴政的开端，或始作俑者。研究土改，对理解中共国家行为的内在逻辑，预测中国乡村未来走势，都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要介绍的内蒙东部土改，是东北解放区土改“大舞台”的一个小插曲。通过放大这滴水，或有利于看清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中共国家副主席乌兰夫，在主政内蒙20年间（1946—1966年），曾在东北解放区土改运动中，成功抵制并及时修正东北局的左倾政策，在自治区范围内“另搞一套”，温和政策延续到五六十年代。假如东北局主导的是周立波描写的暴风骤雨式“暴力土改”，那么，乌兰夫在内蒙古实行的，则是慎重稳进式“温和土改”。两者有何本质区别？为何出现这种区别？其后果有何不同？等等，便是本文探讨的主要内容。

这个问题，除了涉及民族区域自治政策，还涉及乌兰夫家族成员的身世沉浮，敏感性至今不衰。所以，除内蒙本地学者偶尔提及，国内外相关研究很少，甚至连知道这回事的人也不多。

本文研究方法，基本采用历史文献法，也加进个人长期观察和对比思考。我原籍冀中，属于晋察冀边区，没赶上较早土改。但上小学时，常听村民议论“这块地原来属于张三，如何变到李四名下”等等，可见他们对土改的集体记忆犹新。后来在“第二故乡”内蒙古生活13年（1959—1972），开始接触东部土改话题。1965年春，我所在的内蒙师大全校停课，批判校党委书记特木尔巴根的“民族分裂”问题，他的“罪状”之一，是在东部土改工作队期间，包庇其地主父亲关布拉罕，不分地，也没定地主成分。后来才知道，那并非特的个人错误，而是当时乌兰夫和自治政府的特殊政策，名为“慎重缓进”（后被周恩来改为“慎重稳进”，见下文）。深延到牧区和半牧区，则成为著名的“三不两利”政策（不分、不斗、不划成分；牧主、牧工两利）。

乌兰夫倒台之后，我们作为在校学生，又遵照北京部署，全面批判“当代王爷乌兰夫”。此时才知道，乌的“温和土改”，是经毛、周恩准过的，从40年代确立，延续到50年代的合作化公社化，和60年代的大饥荒。该政策对内蒙农牧民，有程度不同的“宽厚仁慈”。尽管乌兰夫的“温和土改”，受到某些汉族领导人（如新疆书记王恩茂）挑战，说它是“阶级调和”，最后毛周等人，居然肯定乌兰夫，否决王恩茂。把内蒙经验树为民族地区样板，进一步向青海、甘肃、新疆、西藏等地推广（见下文）。

然而，恩准乌的仁政，仅是障眼法或遮羞布，北京高层并非真心认同。因此，乌兰夫非但无功，反而得祸，引起毛周警惕，怀疑他有民族分裂野心。到六十年代，这种猜忌防范，演变成内蒙高层权争的聚焦点，最终成为打倒乌的导火线之一。

1966年4、5月间，文革来势汹汹。然而，除了校园大字报热闹外，党政军机关表面风平浪静，实际地火运行。先是5月1日，华北局派解学恭率工作组到内蒙，传达第一书记李雪峰对乌兰夫的批评，敲打他有“狭隘民族主义”。接着，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

会议，华北局召开“前门饭店会议”，实为华北区“闭门小文革”。河北的林铁、山西的卫恒、北京的彭真、刘仁、天津的万晓塘、张淮三等，先后遭到整肃。内蒙的重头戏，则是解决乌兰夫问题。中央派刘、邓约谈乌兰夫，给他确定五条罪状，包括“另搞一套”，“阶级调和”，“地方民族主义”等等。这些所谓“罪状”，追根溯源，都跟40年代内蒙东部土改有关。

其后，内蒙跟全国一样，文革波涛汹涌。“二月逆流”期间，发生首例解放军开枪屠杀学生（韩桐）事件〔1〕。滕海清被毛、周临时点将，从北京军区空降内蒙，组建革委会，实行大清洗，全面推行极左路线，“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简称“挖肃”运动）”成为斗争主线，最终演变成“内人党冤案”，历时两年，导致34万蒙古人遭关押，上百万受牵连，数万人死亡（据不同来源，两到四万不等），成为中共建政以来最大丑闻之一。要知道，当时内蒙的人口总数，不过1300万，蒙族200万，占比15%。但他们的受害比例却非常高，死亡率百分之1—2%，伤残率4%，关押率17%，株连率50%〔2〕。

从1966年5月始，乌兰夫便失去自由，被软禁多年。到文革后期，毛周为稳定内蒙，不得不逐步给乌兰夫松绑，恢复他部分权力。邓小平时代，更把乌的名誉地位提升，官拜国家副主席，但不准他重回故乡。两次回内蒙短暂访问，都在严密监控下，受种种限制，最终让乌兰夫跟陈永贵一样，在京城窝囊而死。

乌兰夫死后，他的子女和家族成员，有不少身居高位，但象征大于实权。如同西藏、新疆一样，北京再也没有雅量，让民族干部重掌地方大权，最多不过充当汉族书记的配角。从这个意义上说，探讨70多年前的内蒙东部土改，不但有利于思考土改本身的功过是非，也有利于认识“民族自治”政策的真假虚实和利弊得失。

## 一、内蒙古“自治成功”，解放区如虎添翼

内蒙幅员辽阔，面积118.3万平方公里，占中国总面积的12%，跨越西北、华北和东北，是仅次于新疆的第二大区。四十年代末的内蒙东部，曾属于东北解放区一部分。1949年之后，内蒙大多数时间被划为华北范围。

本文无意追踪内蒙民族运动的久远历史。这里重点分析，从日本投降到中共建政前后，在东北解放区与内蒙古自治区建立过程中，犬牙交错的地缘政治互动、国际局势变幻、民族恩怨情仇等因素，以便理解，当时乌兰夫主政的内蒙东部，和中共东北局主导的解放区土改政策之间，为什么发生摩擦纠纷，以及乌兰夫最后怎么说服中央，“紧急纠偏”，最终实行了一套“另类政策”。

众所周知，中共势力在东北迅速壮大，跟1945年8月8日，苏俄对日宣战，红军迅速进入东北有关。一周后的8月15日，日本投降。国共开始争夺东北控制权。斯大林搞了明暗两手，表面支持国军接收大中城市，动员共军退守乡村；暗地里，则帮共军扩充实力，更新装备，提升战力。另有十几万训练有素的日本关东军战俘（东北境内六万，苏联境内十万）被红军强制改编，加入林彪的四野。

与此同时，原满洲国治下的蒙古人，受局势影响和苏蒙两国支持，也迅速掀起民族革命潮，争取“民族独立”与“内外蒙合并”的呼声高涨。他们不仅迅速建立了“东蒙自治政府”，还组建了五个骑兵师，兵力数万，其中许多人经过日伪军校的正规训练。然而，面临国共对峙，这股迅速壮大的民族武装力量，政治立场和方向并不明朗。

关键时刻，乌兰夫受延安派遣，“单刀赴会”（周恩来赞语），代表西部蒙族各派，到东部蒙区做统战工作〔3〕。1946年三月，乌兰夫先到赤峰，拜会东蒙自治政府负责人博彦满都、哈丰阿和特木尔巴根〔4〕，商谈内蒙东西部统一问题。经乌兰夫真诚游说，三位东蒙领袖同意停止“内人党”活动，愿意参加“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领导工作。4月3日，各路人马齐集承德，召开著名的“四三会议”，表决通过《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会议的主要决议》，包括“接受中共领导”，解散“内人党”，哈丰阿加入共产党，特木尔巴根由苏共党员转为中共党员，等等〔5〕。“内人党”的外围组织“内人团”，则集体转为中共外围组织“青年团”（共青团前身）。

统战基础奠定后，乌兰夫马不停蹄，积极筹建由中共领导的“内蒙古自治政府”（内蒙古自治区前身），和“内蒙古自治军”（内蒙解放军骑兵）。据《维基百科》的说法，1947年4月23日，内蒙各族代表，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市）举行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内蒙古自治政府，乌兰夫为主席，哈丰阿为副主席，阿思根、特木尔巴根、奎璧等12人为委员。当时辖区包括六个盟（呼纳盟、兴安盟、哲里木盟、昭乌达盟、锡林郭勒盟和察哈尔盟），即今日内蒙东部和中部（大约占现在版图一半），人口两百多万，其中50万蒙族〔6〕。而位于华北和西北的蒙古族聚居区，当时还鞭长莫及，有些尚在国军控制下。因此，四十年代末开始的东北土改运动，基本包括内蒙古自治区东部大部分农耕区，和多数半农半牧区。

内蒙自治政府的正式建立，是极为隆重的大事。据史料记载，环山抱水的王爷庙市气象万千，满街国旗（应是民国旗）飘扬。主席台中央，并排悬挂着斯大林、毛泽东、乔巴山、乌兰夫的巨幅画像。中共西满分局和西满军区代表张平化，辽宁省主席阎宝航，黑嫩省议长于天放等中共东北高官，均到会祝贺。张平化致辞时，还赠送四句话：“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实现自治，争取自决”。他解释说，“中共是坚决赞成民族自决权的，愿以最大努力协助蒙古民族的解放。”又说，“一年来的自治运动是朝着民族自决的大道（前进），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更是大进了一步，是为实行自治，争取自决的必要步骤。”〔7〕与此同时，以白云梯为代表的原“内人党”右翼，则选择跟蒋介石走，正随同国府往台湾转移。

可以看出，在中共领导下，通过乌兰夫控制的内蒙古自治区，不仅充满独立倾向与大一统倾向之间的民族矛盾，还交叉着苏联、外蒙与中国之间的国际互动，也包括亲共与亲蒋势力之间的明争暗斗。因此，刚组建的内蒙自治政府，虽然在中共领导下，但地方和民族特色，起码表面上，还受到延安和毛的兼顾，这可从张平化的上述贺词得到佐证。

几种因素加到一起，促成乌兰夫为代表的延安派获得胜利，主张民族独立和内外蒙合并的东蒙政治派别，被和平收编，最终统一在乌兰夫为首的自治政府领导下。经过改编的原东蒙自治军数万骑兵，成为解放军一支劲旅。在共军机动能力比较差的当年，内蒙骑兵从东北驰骋到广东，为中共夺天下，冲锋陷阵，屡建奇功。后来解放军进藏，遇到困难，毛又说服乌兰夫，派内蒙骑兵增援，重覆历代王朝“以夷制夷”的套路。尽管乌兰夫反对镇压藏人，也得服从，此是后话。总之，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应该被视为乌兰夫之所以有胆量，也有能力，可以跟中共东北局据理力争，在土改问题上“有限度”分庭抗礼的原因所在。

## 二、东北局暴力土改，冲击波祸延内蒙

东北解放区土改，大约从1946年冬开始，1948年冬结束，尽管刘少奇在河北西柏坡主持全国土地会议，制定《中国土地法大纲》的时间，是半年多以后的1947年7月中旬。换句话说，东北是“先土改，后立法”，起码在立法前的半年多时间，土改所依据

的，仅是中共的党内指示（1946年5月4日发出的〈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严格说，没有法律依据的土改，应属非法，等同掠夺抢劫。

回到东北土改。著名作家周立波曾在1946年9月到黑龙江珠河县元茂屯（今尚志市元宝镇）领导土改，收集素材，1947年5月回省城哈尔滨，写出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后获“斯大林文学奖”），成为东北土改的样板作。请注意，《暴风骤雨》写的故事，离《土地法大纲》正式出台，还有几个月，说明无法理依据。可是，如今的元茂屯，已经建成“纪念馆”，成为红色旅游点。为纪念《中国土地法大纲》60周年，央视制作了系列片。以没有大纲指引的元茂屯为样板，纪念大纲60年，有点滑稽。我粗看了几集，感觉净是当年老话套话，空话废话，没有丝毫历史反思。我无意对中共土改做整体评价，只想笼统说说感觉。如果站在“打江山坐江山”的红二代血统论立场，土改当然功在千秋，利党利国；但如果站在文明进步与普世价值立场，尤其在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前提下看，我认为台湾的“民国土改”更应该肯定，而中共的暴力土改，则需深刻反思，全盘否定。

我同意清华教授秦晖对中国历代土地问题的基本判断：中国农耕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官民冲突，而非土地兼并与贫富分化。农民起义的原因多为“官逼民反”，而非“无地造反”。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比，中国农村的土地兼并与集中程度并不高，基本是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若采用减租减息和国家赎买等怀柔政策，避免“暴风骤雨”，同样能够实现“耕者有其田”。在土地私有下，通过农会扶植，兴办产供销信贷合作等非政府组织，照样可以实现农业的规模化与现代化，日本、韩国和台湾，都是这个路数。只要参观对比元茂屯的暴风骤雨纪念馆和位于台北松山区的土地改革纪念馆，就不难看出两种土改的优劣高下。

至于中共为什么非要“一边倒”学习苏联，消灭地富，走集体化道路？这当然涉及阶级斗争、消灭私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等意识形态因素，但更为精明的实用主义算计，也是重要原因。比方说，通过抢浮财分土地虐杀地富，强化阶级意识，激化社群对立，为打内战扩充兵源，补充粮草等等，暴力土改确实发挥过很大作用。至于天下归一、政权到手之后，再换个口号，收回土地，走“集体富裕（实为集体贫穷）”之路，那么，面对规模细小的个体农户，要比苏联消灭富农，容易得多。列宁当年搜刮粮食，需武装下乡，跟富农打仗；而中共从农民口里夺粮，基本不费力气，下个通知就行。中国农民一盘散沙，三年饥荒连讨饭都不让，饿死数千万，也没公开抗粮造反。记得政治课讨论合作化时，有个论调说，中国合作化之所以比苏联顺利，就是因为先分土地，后搞集体，从而减少了阻力（经济学叫“交易成本”）。

以今天眼光看，中共土改的整体设计，本来无法可依，已经左得出奇，到具体执行时，基层还要进一步左倾，得寸进尺，添油加醋，宁左勿右，加倍胡来。抢夺粮食浮财，瓜分土地房产，对地富家人批斗羞辱，游街示众，甚至肉体消灭，这些花样，在我们老家1946年土改中，司空见惯。

据中国科大前校长管惟炎先生回忆，他参加东北土改的时候，曾见证过两次离奇的极左狂潮，一次发生在丹东市宽甸县，在抢分浮财时，逼死、打死人的比例非常之高。当时该县人口只有两万，打死两千，死亡率10%。另一次发生在辽源市东丰县。贫农出身的县委书记和公安局长，突发奇想，在县城大搞所谓“贫下中农坐天下大会”，把全县地主通通绑起来，从农村押到城里，在十字街口的东西南北四面，跪成两排，贫下中农浩浩荡荡列队，从四面进城，地主跪着磕头。这样做的目的，据说是“把几千年来残余的封建势力彻底打垮”。

这里再介绍一种连中共自己都看不下去的新花样，叫“扫堂子”，类似文革“红八月”的反覆抄家批斗。据央视说，“扫堂子”一般以村屯为单位，由贫雇农组织扫荡大军，到其它村屯揪斗地主、富农、甚至上中农，对他们反覆过堂（就像扫地一样，来回扫反覆扫），抢分地富的土地财产，不讲政策，一切由贫下中农说了算。可以重定成份，把已经分掉的财物收回来重分，把中农划成富农，富农划成地主，等等。有的甚至成群结队，进城去分“浮财”，陆续发生哄抢城镇工商户的行为。当时在《东北日报》上，还报道了这种做法，为之欢呼，说什么“群众真正起来了”，“革命高潮到来了”。“极左”的“扫堂子”风，还刮到学校。学生成立“贫农团”，把地主子弟拉到农村，交给贫下中农批斗。有的中学，把老师都拉回村去批斗，学校不能上课，关门了。因为蒋南翔曾对“扫堂子”有所抵制，在东北工作会议上，还遭到围攻批判，说他“太右”〔8〕。“极左”之风，一直刮到1948年春土改后期，东北“政委会”才在《东北日报》上发表社论，开始“批左纠偏”。

有趣的是，周立波写《暴风骤雨》的时间，跟内蒙古自治区政府成立的时间一致，而且接受同一个东北局领导，尽管不是同一分局（内蒙属西满分局，元茂屯归东满分局），但大政策不会两样。因此，暴力土改，经过党媒渲染和文件吹嘘，自然要祸延内蒙。下面是我熟知的一个案例。

内师大同学包却吉（蒙名却吉扎拉森），出生在兴安盟扎赉特旗一个地主家庭，土改那年，六兄弟姐妹都很小（从一岁到十岁），虽然父亲当过伪满旗长，但暗中帮助革命党和抗日联军，本属统战人士，理应受到保护。家人主动交出大部财物，也分掉了多余的土地耕畜，彻底变为自耕农，可勉强维持温饱，自以为平安过关了。没料到，一场大规模的“扫堂子”歪风，从临省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吹来，数百外来暴民，不知道包家历史，也不管他威望高低，只顾敛财逞威，手段特别残忍。不但把他家翻箱倒柜，挖地三尺，抄走像样衣物，还把他父亲挂上黑牌，戴上高帽，当众批斗。最后动手打人，捆绑双脚，套上绳索，在地上拉着跑。这个方法在我们老家叫“拉地主”。一帮人拉累了，再换另一帮人，直到把活生生的壮汉，拉成一具僵尸。等家属去收尸才看清，父亲的半个脑袋血肉模糊，另半个已经化为泥土。

父亲死后，全家沦为赤贫，寡母只好变卖剩余家当，带子女迁居到海拉尔，靠给人拆洗缝补艰难度日。后来自治政府落实政策，众弟妹才靠助学金完成学业。

其实，东北土改的极左风暴，并非局限在扎赉特旗，其它区域也相当严重。客观而言，自治政府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人才和经验不足，未能充分认识内蒙农村的阶级特点和民族特点，尤其是蒙古族农民经营农业的特殊情况，更不知道土改怎么搞，只能遵照上级（西满分局）指示，照搬汉族地区经验，因此，难免左倾之害。

结果之一发生在农区。在斗地主和划阶级时，各地普遍出现打击面过宽现象，伤害了群众的利益。中共中央规定，被分被斗的打击面，不超过人口的10%、户数的8%。而兴安、呼伦贝尔、纳文穆仁三个盟的打击面，平均占到户数的20.8%，人口的25.6%，超额一两倍。个别严重地区，更超额两三倍。例如兴安盟西科中旗西太本区，地富被分被斗者，占户数的20.97%，人口的29.76%〔9〕。哲里木盟大部分旗县，也出现打击面过宽问题，其中通辽县打击面竟占人口的29%〔10〕。

结果之二发生在牧区。内蒙牧区占全区面积五分之三，人口只有20多万，以蒙古族为主。根据中央和自治区的规定，因为自由放牧的历史传统，牧场土地从不私有，所以牧区不搞土改，只搞民主改革，也就是“减少剥削，合理负担”。然而，1948年内蒙民主改革开始，派往锡林郭勒盟、哲里木盟和昭乌达盟的工作团，盲目搬用农区土改，提出“牧者有

其畜”“彻底消灭封建”“群众要怎么办就怎么办”等错误口号，对牧主和召庙的牲畜财产一律没收，平均分配，还对牧主采取体罚斗争，各地不同程度出现乱打乱杀现象，使日趋稳定的牧区社会，再度出现紧张局面，造成牧业生产混乱，导致牲畜头数急剧下降。据统计，昭乌达盟牧畜总数，由1946年的146万头（只），下降到1948年的93万头（只），损失近三分之一。察哈尔盟的正白旗，在短短几个月内，便损失牲畜5万余头（只）（11）。

### 三，乌兰夫“中流砥柱”，改“稳进”终获肯定

乌兰夫及其同事，面对“暴风骤雨”给内蒙带来的伤害，自然不会无动于衷。他们经过调查研究，拿出充分理由，认为以内蒙特殊的自然、历史与社会状况，不应照搬其它汉族地区的土改经验，必须因地制宜，事实求是，反左纠偏，改行符合内蒙实际情况的“温和土改”。具体而言，他们把内蒙特殊情况归纳为以下几条：

第一，历史传统：蒙古人习惯游牧，不尚农耕，没有土地私有观念。汉族移民到蒙区务农，沿用租佃关系，并无土地所有权，更没土地买卖，这跟汉族农区有很大区别。

第二，“蒙租”与“二地主”现象：清朝晚期，官府鼓励农耕，赐给蒙族士兵和臣民一些“户口地”，导致蒙古人占地较多。但他们不善耕种，于是包租给汉族“二地主”，仅收较少“蒙租”；二地主再转包给汉族农户，收较高地租。因此，汉族“二地主”的生活，往往比蒙族“大地主”更为富裕。因此，单看拥有土地多少，并不能准确判断剥削量大小。

第三，召庙土地：内蒙跟西藏都盛行喇嘛黄教（藏传佛教），因此内蒙东部召庙很多，其主要经济来源，靠官府赐给的庙地，多以招租方式经营。这部分土地怎么分配？涉及民族宗教政策，需要慎重处理。

第四，畜牧和农耕的区别：在纯牧区和半农半牧区，牛羊牲畜，既是牧民的生产资料，又是他们的生活资料，如果牧民辛辛苦苦提高出栏数，却因“富裕”而被清算，自然会多吃少养，造成牧业生产停滞或下降。

经乌兰夫和自治区向中央呈送报告，据理力争，中央最终同意内蒙的意见。于是，1948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了由东北局主持的“内蒙古干部会议”，总结农村土改和牧区、半牧区民主改革的经验教训。乌兰夫在会上强调：“蒙古族农民农业劳动技能比较落后，上升为富农是不容易的，不宜斗争。蒙古人由牧业转入农业是被迫的，因为不会种地等原因，出租自己的户口地、生计地、抚养地的小地主，也不宜斗争。至于蒙古族中农为数很少，更应特别注意，绝对不许侵犯。”

根据会议精神，自治区政府随即制定六项“纠偏”政策：

一，大中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分给农民，同时必须给家人保留与农民同等的一份，只有蒙奸、恶霸本人不分。

二，对出租户口地之蒙古族小地主，不斗，也不分其土地财产。

三，蒙族富农，剥削不超过总收入50%的，财产一般不动，土地只分多余部分。

四，中农坚决不动，只许增加财产，不许减少。

五，对喇嘛和召庙占有的土地，一部分收归公有，一部分减租减息；对喇嘛实行团结改造方针，鼓励喇嘛从事生产劳动。

六，在牧区实行“三不两利”政策，就是“不分牧主的牲畜，不斗争牧主，不公开划分阶级成份”。大牧主的（零散）牲畜可以分给牧民，但牧群不分，分畜不分群，避免牧业生产下降〔12〕。

随着新政策出台，各地迅速贯彻落实，凡执行过极左政策的，必须按新政策“纠偏”，很快退赔改正。错划错斗错分的，经济上要赔偿，政治上要赔礼道歉。比如兴安盟突泉县水泉区，被斗218户，占总户数的16%，其中112户被错划为地主和富农。经过“纠偏划正”，全区被斗户降至96户，占总户数的5.3%，退回原分走的土地6,394.3亩，对错分的房屋、耕畜、农具及衣物等，也限期退还。突泉县的例证说明，“纠偏”幅度之大，超过50%〔13〕。类似情况也发生在哲里木盟，经过重划阶级之后，打击面由原来的20%几，下降到10%左右，纠偏幅度，也超过50%〔14〕。这么大的调整幅度，说“纠偏”其实不准，应该算“推倒重来”了。

（未完待续）

□ 来源：《重审毛泽东的土地改革：中共建政初期政治运动70年的历史回顾》，宋永毅主编，香港田园书屋2019年12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